

余开伟 著

突围者的冲刺

——余开伟文化随笔精选

突围者的冲刺

——余开伟文化随笔精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围者的冲刺：余开伟文化随笔精选 / 余开伟著.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438-4753-8

I.突... II.余... III.随笔—作品集—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3230号

责任编辑：唐长庚

装帧设计：博爱天使

突围者的冲刺——余开伟文化随笔精选

余开伟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7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154 × 230 1/16 印张：17.75

字数：220千字

ISBN 978-7-5438-4753-8

定价：20.00元

寂寞行程的足印

(自序)

作为曾经长期在出版单位从业的文学编辑，写作仅仅是我的副业，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我的职业标志。但是，作为一个长期献身文学事业的跋涉者，写作却是我的精神寄托、灵魂的归宿，它是我的生命追求和价值所在。尽管在这五光十色、纷纷扰扰的商业时代和消费时代，文学已被无限膨胀的物欲、肉欲、权欲玷污，写作很大程度上已被一些文坛新贵、文坛暴发户和形形色色的文坛嬉皮士当做谋求名利的工具和哗众取宠的手段，但对于我这样一直处于文坛边缘无任何光环可言的小卒来说，文学写作依然是严肃而艰辛的荆棘之路，只要一息尚存，我将为文学的尊严拼搏冲刺，突围前行，功败垂成，在所不惜。

这本《突围者的冲刺》是我在新世纪伊始所写的文字（除其中少数几篇文章外）。文章满纸书生泪，我自知这些浅近的文字所发出的粗犷声音，不合潮流，不合时尚，可能被当做“另类”不屑一顾，可能被势利的文坛冷眼相看，这都无足轻重，无须叹惜，我深信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真诚和真理，只要芸芸众生当中还存在精神探索者和读书种子，在荆丛棘莽中踽踽独行者仍然能够寻求到共鸣的知音；我常常从热情读者的来信支持和文学前辈诚挚的鼓励中获取力量，倍感欣慰，并促使我不断反思和自省，看到自己的不足及缺陷。

去年年初，江苏的高级工程师汪一芳先生在书店购买了我的两本拙著（《文学的蜕变》、《湖南当代文学评论家选集余开伟卷》），寄来要求题辞留念，并致信言道：“时下出版物数不胜数，标牌各异，花

枪种种，但满坑满谷多为生猛海鲜之类，既贵又怕吃坏肚子，而实实在在如您著作般的五谷杂粮，反倒成了难得一见的稀罕物，叫人无话可说。拜读您的著作，就如从山阴道上行走，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沏一杯清茶，书卷在手，时有豁然开朗的好心情，顿觉心清神爽，不亦快哉。”这位远方陌生读者朋友的肺腑之言确实使我十分感动，其中过誉之处，却又使我羞愧难当。去年春节期间，我意外地收到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老师的贺卡和题辞：“人生至高的境界，视压抑如毒瘤，见欺诈如魔爪，嘘之，击之可也。兄之行为和写的书，足可见此一人格，持之以恒，无疑是人生最高境界，当无愧于天地，更无愧于自身。”面对前辈老师的教诲，我既十分汗颜，同时，愈其感到责任在肩，不可懈怠。然而，在我平淡的写作生涯中，无论是受到称赞鼓励抑或是冷嘲热讽，保持内心的理性和清醒却是至关重要的。我所尊敬的余光中先生旅居美国的女儿在她所写的《萤火山庄》一文结尾写道：“在桌灯下往往坐到深夜，楼上的家人都已鼾然，林中也寂了万籁，只剩下手中这支笔陪着我醒着，从十九岁的少年一直醒到现在，便感觉惟寂寞始能长保清醒，惟清醒使人永耐寂寞。”这真是智者的深刻人生体验和悟道之言，窃以自镜，在羞惭之中仿佛聆听到天籁之声，顿时心境澄明，精神超升，荣辱成败均置之度外。

唐代苦吟派怪杰贾岛诗云：“苦心寻吾祖，寂寞在潇湘。”这是古今精神探索者的人生宿命，我安于这种人生宿命。《突围者的冲刺》这本小书即是我在新世纪文学长征途中寂寞行程的一行踉跄足印，我不敢奢望无愧于天地，但求无愧于自身。

附言：此文未发出，突然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寄来的讣告，惊悉恩师许觉民（洁泯）先生病逝，极其悲痛。一代风范今去矣，令人不胜唏嘘。这段日子，艺坛笑星马季先生病逝，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不断，而文坛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许觉民先生病逝，是当代

文坛重大损失，报刊至今却冷漠对待，稀有文字纪念，两相对比，不禁心寒气短，感叹备至。

拙著后面附录了有关评论文章，并非“借文贴金”（也贴不了金），而是出于对知音者的拳拳谢忱。对于我这样的踽踽独行者，在苍凉和孤寂中默默耕耘，能够得到些许理解和支持，已经是极其难得的人世温暖了，我珍视这种有价值的存在，并不在乎俗世的褒贬，但愿读者宽容。

这本小书的出版十分艰难，承蒙中国作协铁凝女士、湖南出版集团新任领导、（青年评论家）龚曙光先生、湖南作协新任领导龚政文先生（青年评论家）、湖南文艺出版社新任社长刘清华先生以及湖南文艺出版社前任社长吴智勇先生的鼎力支持与帮助，此书才得以面世。这么多专家和好人的关注鼓励，使我十分感动。这证明人间自有真情在，文坛并非少知音。湖南人民出版社几位领导和责任编辑唐长庚先生的宽容和帮助，我亦铭感在心，在此一并致谢。

2007年元月修订于长沙望月湖

目 录

寂寞行程的足印（自序）	1
-------------------	---

第一辑

历史迷雾中的认知和探求	3
储安平生死之谜真相	12
假鲁迅事件真相	18
怎样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21
慈禧是优秀的政治家吗	27
“父荣子贵”观念在支配谁	29
被围困的清高	32
名家与批评	38
附：许觉民先生的一封信	44
“七月派”老诗人彭燕郊与余开伟的通信	45

第二辑

于光远的警世之言	49
对王蒙《青狐》的误读	51
周涛“判断”的失误	55
开拓者冲刺的生命足迹	59
千年学府奏新声	65
对历史人物的深层透视	70
突围者的冲刺	73

为什么《拒绝北大》.....	75
作协不应成为一个官僚机构	77
致中国作协的公开信	79
答郑州晚报记者专访	80

第三辑

江南奇女的惊世义举	87
傅聪与《傅雷家书》	93
江南奇女今犹在	99
附一：良心的明灯 舒展	108
附二：读后抄存 张中行	110

第四辑

谁是文化杀手	115
余秋雨是否应该反思	119
商风秋雨愁煞人	124
余秋雨是否逃避历史事实	135
无法回避的历史诘问	140
质疑余秋雨的“记忆文学”	142
《余秋雨现象批判》编辑札记	147
批判的延续	149

第五辑

高行健实现了民族宿愿	153
文学湘军出路何在	156
反思文学湘军	159
消亡的《湖南文学》	164
商业化的造星运动	166

世纪之交的黄钟大吕	171
深邃的灵魂浸润	173
先声夺人“文”“武”俱佳	175
京剧的桂冠	177
读者深层文化精神生活需要	180
谁丧失人性尊严	183
新世纪的遗憾和期望	185
文学批评价值失范	187
不要用炒作蒙骗读者	189
他们的言论不足为信	191
竞争中凸现优势	194
百尺竿头待更进	197
它不迎合世俗与时尚	199
文学期待什么智慧	200
我看网络文学	202
田汉是伟大的音乐家吗	204
百般红紫斗芳菲	206
群雄评议易中天	209
附：我要给易中天泼点冷水	215
编辑的苦衷与无奈	217

第六辑

母亲的眼泪	223
戴银项圈的芳芳	228
生者对死者的感念	233
天涯孤客真难度	236
惊魂魔鬼城	245

为时代作证(代跋).....	260
附录一：文学的蜕变.....	263
附录二：孤独的突围者	266
附录三：文如其人的“唐·吉诃德”.....	268
附录四：与新西兰华人作家景平的通信	271

第一辑

历史迷雾中的认知和探求

——与《文艺争鸣》编审朱竞的对话

朱竞：回顾和反思 20 世纪这 100 年来所走过的坎坷之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遇过无数次巨大的灾难。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时代是影响其性格、命运和价值形成的重要因素。在 20 世纪大大小小的运动中，很多人都难以超越自己在那个年代所形成的生存方式。那么，您对中国 20 世纪的印象又是怎样的呢？

余开伟：20 世纪的中国在漫长的 100 年当中，充满着苦难和血腥，荆棘和陷阱，一直笼罩着浓烈的历史迷雾，中国人民在苦难和血腥中拼搏挣扎，在荆棘和陷阱中探索前行，为了追求光明和希望，几代人付出了惨重的牺牲和代价，至今没有走出历史的怪圈，没有真正实现世纪的梦想。这就是我对中国 20 世纪的总体印象。我们不妨进行回顾：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经历过呼唤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启蒙，但并未得到长治久安和民族兴旺的结果，接下来的却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尔后则是日寇入侵造成的烽火遍地、山河破碎的八年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尚未巩固，十年内战继续的解放战争又突然爆发，和平幻想再度破灭。新中国诞生后，人们看到了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希望，看到了幸福生活的光明前景，无比欢欣鼓舞，然而，极权主义发动的“反右”斗争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饱受摧残，元气大伤，而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则使整个新中国濒临危亡，全民族遭受重创，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20 世纪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接二连三经历如此惨烈的民族灾难，使国家丧失了自立自

强于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契机和优势，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了历史的重大转折，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使我们告别了历史的悲剧，获得了国家和民族振兴的生机，但笼罩中国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迷雾实在是太长了，极权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根深蒂固，民族的因袭重担实在是太沉重了，这都使实现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举步维艰。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并不等于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胜利，并不等于实质意义上的国泰民安。21 世纪的中国是否能摆脱历史的阴影，在“全球化”的世界语境中得到认同，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优先发言权，这还有待时代的检验。

朱竞：的确是这样。在一场场大的灾难过后，人们的目光会本能地固定在记忆的灾难上，一个太容易忘记灾难的民族是十分肤浅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努力地寻找形成“文革”的深层原因，分析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精神史。说到了知识分子精神，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您怎样理解？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余开伟：知识分子精神存在是肯定无疑的，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就有关心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一些有觉悟、有思想的士子文人，历来就是以关注国家兴亡、民生疾苦为己任，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等古训即是历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文学诠释。当然，这种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无法超越士大夫阶级的历史制约，但他们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是极为可贵的，这种文化承续流传至今，“五四”以来的优秀知识分子很多人继承了上述文化传统，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先进知识分子人道主义和社会批判理念，使知识分子精神包容了更深沉、更广博的思想内涵和理想追求。以我粗浅的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崇尚的所谓知识分子精神，即是要求成为时代的见证人，自觉地担当启蒙和救亡的责任，

呼吁和维护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公正，保持对黑暗势力和强权的抗议和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支持，对自由、平等、光明的向往和追求。这种理想主义的趋向在强大的社会障碍面前或许带着乌托邦式的虚幻色彩，却值得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付出生命的激情和道德勇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灵魂寄托和价值所在。现在学术界、知识界对知识分子是否仍需担当启蒙和救亡的责任存在争议，其实知识分子承担启蒙和救亡的责任并未过时，而是任重道远。国民素质的更新和改造，民族的振兴和重建，依然是启蒙和救亡的应有要义，只是这种启蒙和救亡在新世纪才有着崭新的时代内核和延伸。当然，知识精英要担当启蒙和救亡的责任是要把自己放在与民众平等的地位，对话交流，而不是充当“救世主”传教布道，而且首先要自身进行灵魂涤荡和心灵救赎才有真正的发言权，否则将成为笑谈和泡影，只能是纸上谈兵。

在我看来，上面所说的知识分子精神，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群体都具备，而只是存在于知识分子的精英当中。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而且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性。趋时趋利，依附体制，崇尚时尚，软弱自欺，历来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环顾历次政治运动和当今一些知识分子的种种形状，很难寄予更高的期望，要求这类知识分子具备上述知识分子精神，那是很不现实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何况当今知识分子群体在金钱和权势的双重利诱和夹击下，正在逐渐分化和蜕裂衰变，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已蜕变成既得利益者和体制的奴仆，他们已走向知识分子精神的反面。

朱竞：的确，我们无法回避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弱点的反思。回顾中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道德原则和价值立场的背离。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复杂，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大多数没有完成人格的转化，没有实现人格的真正独立，更没有获得真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那些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和自我否定的文章，真是感慨至

极。您的人生是坎坷的，了解您的朋友们大多都知道您的经历，您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能讲一件苦恼的事吗？

余开伟：对于一个曾经做过理想主义光明梦的知识分子来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我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青年时代在“文革”动乱中的遭遇和经历，那种乌托邦的幻梦被血腥和暴力击碎，被邪恶和欺骗摧残所造成的身心苦痛是撕肝裂肺、刻骨铭心的。在“文革”腥风血雨的笼罩下，我的青年时代无法逃脱苦难和不幸的人生宿命。20世纪60年代初，我正值弱冠之年，离开学校从故乡远奔塞外，踏上了专业文艺工作岗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艺术剧院任编导工作仅4年，“文革”大灾难即在全国爆发，我所在剧院受到冲击宣告瘫痪解体，像我这样出身官僚家庭且有海外关系又不肯趋炎附势的创作人员，被以“修正主义苗子”、“文艺黑线的孝子贤孙”等诸多罪名惨遭监禁逼供，倍受折磨，九死一生。现在看并不奇怪，1970年我恢复人身自由后，被下放到边远军垦农场当了整整5年的农工，这是一段苦痛的“流放”生涯，却又是一段严酷的人生历练。这种磨砺与体验，使我永世难忘，受用无穷。往事不堪回首，30年的时光悄然流逝，沉淀的记忆却像青铜浮雕，清晰而深刻，历久而弥新。

在军垦农场农业连队做农工的5年劳动生活，使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底层劳动群众的境遇。在连队职工身上，我感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身上很难发现的质朴和本真，乐观和坚忍。特别是他们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精神，是像我这样患得患失的脆弱的“文化人”尤其缺少的，他们一辈子处于最贫困、最落后的生活底层，长年累月担负着最艰苦、最沉重的劳动，得到的仅是勉强维持温饱的最低报酬。他们正当的生存和发展欲望常被忽视和剥夺，他们实际上没有索取只有奉献，没有权利只有义务。在农场连队劳动生活期间，我亲眼目睹了一些悲惨事件，看到一些粗暴和野蛮的行为，发现了可怕的专制和压迫，我感到震惊和痛苦，无奈和迷茫。但农工们对此却司空见惯，全都承受。他们在压抑忍辱中默默挣扎，几近麻木和愚昧，他们的子女

也承受着同样的命运。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如此低下和恶劣，却被冠以“工农兵当家做主”的美名。我沉痛地发现：那种所谓“工农兵当家做主”冠冕堂皇的宣传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空洞虚伪！置身于含辛茹苦的农工之中，与他们长期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我接受所谓“工农兵再教育”的真实感受。

在农业连队劳动之余，我常常冷静思索，不由羞愧于自己的懦弱和卑微。我开始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经受的这些苦难，比起连队农工一辈子经受的无尽期的人生艰辛，实在算不了什么。在无法改变的沉重命运面前，他们是那样豁达，那样坚毅，不奢望分外的欲求，不希望幸运降临。这是并不自觉的坦然的人生态度，但决不仅仅是麻木和愚昧。我开始尊敬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给予了我无私的温暖和帮助，而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从未接触过的闪光点。同时，我为自己沉浸在苦痛情绪中所表现的卑微和软弱感到汗颜，在矛盾复杂的内心冲突中，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必须振作和自救，在绝望和悲观中突出重围。

朱竞：对于“文革”，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则持另一种态度，网上有文章说：“别老谈‘文革’，忆苦会有前途吗？”这就是所谓晚生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凸现。我觉得，像您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以亲历者的身份和角度来回忆、反思、批判和忏悔“文革”，以便冷静地对待过去。能说说您最挚爱的对象是什么(国家、事业、朋友、孩子、爱人、大自然、文艺、科学或是别的什么)吗？

余开伟：对我来说这是个很难确定的问题。我既热爱生我养我的我赖以生存的祖国，也挚爱我从事的文学事业和陶冶我精神境界的大自然，更挚爱我的爱人和我独生的女儿。我对自己的国家怀着复杂的感情。我挚爱祖国五千年灿烂瑰丽的文化和美丽的山川河流以及在这块东方热土上栖息繁衍备受苦难的父老乡亲。但我又为我们国家数千年专制统治遗留下来的久治不愈的精神创伤和驱之不去的历史阴影感到悲哀，为我的同胞当中存在的麻木、愚昧和奴性感到痛楚。我想，在全球化与现代文明急速发展的竞争格局中，只有中国国民素质的优